

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

● 阎海 || 著



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

● 阎海／著

本书由辽宁省
“四个一批”人才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 / 阎海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601-7293-4

I. ①营… II. ①阎… III. ①营口市-地方史-文集
②文物-考古-营口市-文集 IV. ①
K293.13-53②K872.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6913 号

书 名: 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
作 者: 阎海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树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
ISBN 978-7-5601-7293-4

封面设计: 房 龙 彭 文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11 年 7 月 第 1 版
2011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阎海同志撰写的《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即将正式出版，我有幸提前看到了这部书稿，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在我结识的年轻人当中，阎海无疑是属于那种刻苦钻研型的。研究历史被人称作是“钻故纸堆”，首先必须能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和清贫。阎海同志在自己的博客个性介绍中写道：“平生不图官与钱，笑傲红尘三十年。一盏清茶一卷史，半做文章半得闲”。这说明他确实具备了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当年他到辽宁师范大学求学时，我们开始相识，经常在课堂上及课后共同探讨东北地方史的一些学术问题。他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从事史学研究的同行都知道，史学研究不但要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和清贫，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知识积累的过程。作为一位青年学子，阎海同志多年来在东北地方史领域孜孜以求，克服在基层工作搞史学研究资料比较缺乏的困难，千方百计到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翻阅档案，又亲自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先后对高句丽和箕子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写出了有见地的文章。出于对家乡历史的特殊兴趣和有利条件，对营口地区的历史和文物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曾参与《营口通史》等著作的编写工作。通过长期史学研究的积累，《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一书的完成，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

通读书稿，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多年的汗水和心血，其见

解不乏有独到之处。例如，关于高句丽的安市城旧址问题，以往中外学者都比定在今海城市东南英城子古城。阎海及营口史学界的同仁们在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有关文献的记载后，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提出今大石桥市周家乡海龙川古城址为高句丽的安市城的新说法，现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有书稿中对汉代平郭县旧址为今营口鲅鱼圈区熊岳镇温泉村古城址、辽金时期的宁州旧址为今盖州市九寨乡五美房村古城址等问题的说明和考证，都得出了使人信服的新观点。除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之外，书稿中也涉及到营口历史上的行政建置、著名人物、历史典故和文物古迹等，相信读者阅读该书后，将会从中受到许多启迪。

新书即将付梓，阎海嘱我作序。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并无什么建树，只是涉足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时间相对长一点而已。写下上面的话，实不敢称序，权作学习书稿的一点心得和感受，也算是一个同行对新书出版的祝贺之意。希望阎海同志在已经取得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将来在地方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都兴智

2011年元旦于大连。

目 录

序(都兴智)	(001)
--------------	-------

第一章 营口古代史研究

一、“文亨”的建置与地望	(002)
二、平郭县与建安城	(010)
三、隋唐建安道初探	(018)
四、唐安市城址商榷	(024)
五、辽代宁州考辨	(030)
六、明代盖州卫研究	(034)
七、从军功世家到书香门第 ——浅析明清之际盖州卞氏家族的演变	(045)
八、清代营口地区八旗驻防初探	(055)
九、清代熊岳八旗驻防问题研究	(064)

第二章 营口近代史研究

一、巴尔虎蒙古与“没沟营”的由来	(079)
二、清代营口的地方行政建置	(081)
三、营口开埠与营口海关	(085)
四、营口炉银与营口近代经济	(090)
五、近代营口的水陆交通	(100)
六、清代营口炮台火炮配置考略	(108)
七、营口西炮台现存大铁炮考辨	(112)
八、鲜为人知的营口老炮台	(118)
九、日伪经济“统制”与营口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衰落	(122)

第三章 营口文物研究

一、盖州出土“釜内啄戈”初探	(129)
----------------------	-------

二、营口地区汉代文字砖所反映出的汉代丧葬礼俗	(133)
三、熊岳及其周边地区的汉代文化遗存	(140)
四、营口地区辽代遗物的文化特点	(147)
五、明怀远将军卞世祥墓志考	(152)
六、岱北观察使夏继泉印章考	(159)
七、邵松年《松下读书图题跋》考	(162)
八、顺治本《盖州卞氏族谱》的史料价值	(169)

第四章 营口地域文化研究

一、最早载入史册的营口历史人物冬寿	(175)
二、怀顺王与续顺公	(180)
三、清代名臣卞三元	(185)
四、治河能臣于成龙	(191)
五、宰相白潢	(194)
六、营口地区的辽代寺院文化	(198)
七、熊岳历史文化特征概述	(202)
八、“榜式堡”地名探源	(208)

第五章 东北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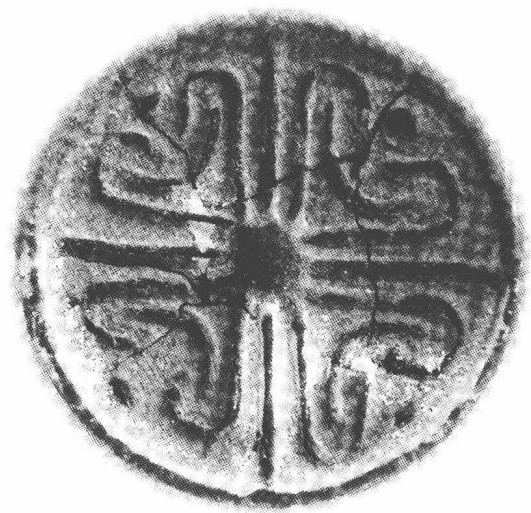
一、箕子东走朝鲜探因	(213)
二、东北古地名中的“天人合一”现象	(220)
三、高欢族源探微	(225)
四、高句丽政权性质浅析	(234)
五、高句丽与殷商的文化渊源	(237)
六、高句丽物质民俗初探	(244)
七、盖苏文姓氏考	(251)

附录:

1. 主要参考书目	(254)
2. 作者主要研究成果	(257)
跋(吕洪伟)	(261)
后记	(264)

第一章

营口古代史研究



第一章 营口古代史研究

一、“文亭”的建置与地望

“文县”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县级地方行政建置，为辽东郡所辖的十八县之一，其地应位于辽南地区近海之地，但具体地点目前尚有争议^①。“文亭”是“文县”在王莽改制时期的名称，《汉书·地理志》：

辽东郡，县十八……文，莽曰文亭。

在《营口市志》、《营口通史》、《营口简史》等地方史著作中，均据此认为王莽“降文县为文亭”^②。那么，“文亭”是否真的是亭级建置？它的具体地点究竟在何处？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文亭”即文亭县

“亭”是秦汉时期的一个最基层的地方建置，《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关于汉代“亭”的性质问题，史学界有不同人理解，但大部分都认为“亭”独立于县一乡一里三级地方几层建置之外的一套行政系统，其主要职能是治安、邮传和一般民事^③。

大家所熟知的刘邦出身泗水亭长、关羽爵封汉寿亭侯，指的都是作为基层建置的“亭”。正因为“亭”是大家熟悉的建置名，所以对于“文，莽曰文亭”这条记载就是容易理解为“文亭”是一个亭级建置的名称。实际上，这是对史书记载的误解。《汉书·地理志》及后来的《后汉书·郡国志》（《后汉书》本无志，后人取晋代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而

① 主要有：“瓦房店陈屯村汉城址”、“大石桥进步村汉城址”、“海城市析木城”、“大石桥汤池英守沟”等几种。

② 见营口市地方志编《营口市志》第一卷“大事记”；于阜民主编《营口通史》第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③ 黄义军《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2期。

补入)在记载各县时均省略其建置通称(县),这在当时成为惯例,因各县均列于“某某郡,属县若干”字样之后,其县级建置已不言而喻,故只需直书其地理专名。以辽东郡为例,《汉书·地理志》在“辽东郡,五万户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字样后,开列出襄平、新昌、无虑、望平、房、侯城、辽队、辽阳、险渎、居就、高显、安市、武次、平郭、西安平、文、番汗、沓氏共18个地名,无一带“县”字,但大家一看便知皆是县名。同样,该书在记载王莽更改地名时也依此惯例只书地理专名,省略“县”字,如“襄平,莽曰昌平”、“西安平,莽曰北安平”、“辽队,莽曰顺睦”……在这些地理专名后加上一“县”字,便是其地名全称。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在涿郡所辖七县中,有一“良乡”;在零陵郡所辖十三县中,有一“湘乡”;在山阳郡所辖十县中,有一“金乡”,皆为县名,而非“十里一乡”的乡名。另外,《后汉书·地理志》所载诸县中,还有“充国”、“安国”、“襄国”等十余个带“国”字的地名,也皆为县名,而不是诸侯国。可见,省略建置名(县)是当时行文之惯例,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文,莽曰文亭”,就会明白“文”即文县,“文亭”即文亭县了。

(二) 王莽改制并无降县为亭之举

《汉书·王莽传》:

郡县以亭为名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

可见,改“文”为“文亭”并非个别现象。这360个郡县见诸《汉书·地理志》的有112个,包括3个郡和108个县。如果认为“以亭为名”就是降级为亭的话,那么新莽时全国的郡县总数应减少360个,至少也要减少112个。但事实上,王莽改制时不但没有减少郡县反而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郡县。

《汉书·王莽传》载:

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

这一数字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西汉103郡、1587县相比,多出22郡、616县。因此,认为王莽改制降县为亭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注意到这一

现象，他在《新莽职方考》一文中写道：

元始五年，莽始以经义更州名，分界凡十二州，并稍增置郡县，迄于天凤元年，总有郡一百二十五，县二千二百三，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今可考者一百一十二。^①

在该文所附的《莽改汉郡县名通例》中，谭先生归纳了王莽改易郡县名的一些规律，其中，其它类的第三条就是“加亭字”，并所列举了以下的例子：

郢——郢亭
文——文亭
驸——驸亭
广信——广信亭
安风——安风亭
爰戚——爰亭
临乐——乐亭

历史地理学博士华林甫在论述王莽改易地名时也提到：

他改名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 把原地名改成带有“亭”字的地名。2. 把原地名改为带有治、安、宁、平、顺等字的地名。3. 取美名。4. 用同义、同音字改地名。5. 用反义词改地名。6. 使用对少数民族歧视、侮辱性的字眼。^②

谭其骧先生明确指出“县以亭为名”，即把原地名改为带有“亭”字的地名，不存在建置降级的问题。刘子敏教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

王莽在篡位后，曾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将“上殷台”改为“下殷台”、将“西盖马”改为“玄菟亭”，这说明西汉末年此三县尚且存在。^③

① 原文刊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6月。今收入《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第3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③ 刘子敏《朱蒙之死新探》，《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很明确地指出西盖马“改为”玄菟亭，而不是“降为玄菟亭”，可见，“玄菟亭”亦为县名，即玄菟亭县。

王莽之所以大量使用带“亭”字的地名，据史书记载是出于某一“符命”，但“符命”原文不得而知，《说文解字》：“亭，民所安定也。”我认为，王莽之所以“以亭为名”应与亭字的这一祥瑞含义有关。

在王莽以亭为名的112个郡县中，有三个郡级建置，据《汉书·地理志》：

东郡，秦置。莽曰治亭……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同亭。……赵国，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为赵国，景帝三年复为邯鄲郡，五年复故。莽曰桓亭。

上述三郡（国）在更名为亭后，仍然为郡级建置，这一点可以从王莽下的一道诏书中得到证明。《汉书·王莽传》载：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定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

这是一道颇为滑稽的诏书，其内容是将原属陈留郡的益岁、雍定、封丘、陈留等县分别划给四周邻郡，即新平、陈定、治亭、祈隧四郡，因当时地名更迭频繁，“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①。所以有了这种连篇累牍说明地名的诏书。不过，我们从中却可看到东郡改为“治亭”后，依然是郡，地盘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封丘县，若以为“治亭”便是一个十里小亭的话，岂不成了以亭管县了吗？另外，在东郡（治亭）与牂柯郡（同亭）的属县中，都有更名后与郡同名的县，更能证明其为县级建置。如东郡的属县濮阳“莽曰治亭”、牂柯郡的属县夜郎“莽曰同亭”。显而易见，东郡为治亭郡、濮阳为治亭县、牂柯郡为同亭郡、夜郎为同亭县。若认为这里的“亭”就是十里小亭的话，就出现了两个“治亭”、两个“同亭”的矛盾。因此，无论是“治亭”、“同亭”还是“文亭”其后都省略了其“郡或县”的建置通称，史书中这样写是当时行文

①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惯例使然，但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区别，以免造成误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述几部地方史专著在叙述东汉时期营口地方建置时提到：“东汉升文亭为文（汶）县”^①。此说同样是错误的。东汉建立后，只是把王莽更改的地名恢复原名，并未“升亭为县”。光武帝时刘秀时期，由于刚刚经历过王莽之乱及农民大起义的战争创伤，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不仅没有升亭为县，反而大量撤销郡县。《后汉书·光武帝记》载：

（建武）六年六月，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的东汉县级建置之1180个，同西汉相比，减少了407个。

可见，王莽时期并未降县为亭，东汉时期也没有升亭为县，“以亭为名”是地理专名的改变，与行政建置的升降无关。之所以产生“降文县为文亭”的说法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省略建置通称这一行文方式的误解。由于“文亭是亭级建置”一说在营口地方史学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影响着对文县遗址的确定（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本着“十里为亭”的观念，认为文县必然是一个面积积极小的城址，没有设县的资格，所以才降为亭。）这一问题不予澄清，势必会使对文亭地望的研究走入误区。

（三）文亭（文、汶县）的地望

1. 关于文县地望的争论。

作为西汉辽东郡十八县之一，对文县地理位置的研究引起了东北地方史学界及考古学界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文县地望仍存在多种说法，观点尚未统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瓦房店市陈屯村说”。王绵厚先生最早在《东北古代交通》^②一书中提出此说，刘俊勇先生在《辽东沓氏县、汶县县治考订》^③及《大连考古研究》^④中亦持此说。

（2）“海城市析木说”。此说为孙进己、冯永谦先生主编的《东北历

① 见营口市地方志编《营口市志》第一卷“大事记”；李洪彦主编《营口简史》第4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② 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第27页，沈阳出版社，1990年。

③ 刘俊勇《辽东沓氏县、汶县县治考订》，《博物馆研究》1993年3期。

④ 刘俊勇《大连考古研究》第83页，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

史地理》^①一书中所提出，该章节的撰稿人亦为王绵厚先生。

(3) “大石桥市进步村说”。此说由崔德文先生在其参与编著的《营口地方史研究》^②和《营口市文物志》^③等著作中所提出。

此外还有“大石桥汤池镇英守沟说”，由于英守沟汉城址已被公认为是汉代安市县遗址，故此说已被否定。

2. 文县县址的基本特征

对古代县治地望的考证，必须与历史的有关记载相符合。根据文献的记载，汉代文（汶）县，至少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1) 临河。文县在东汉以后改称为“汶县”，对此，史学界一致认为，从其名在《后汉书·郡国志》中加“水”旁推断，该县当临近一条河流，县或以水得名。

(2) 近海。《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记载，曹魏正始元年春二月丙午（公元240年4月5日），“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由此推知，汶县应位于辽东半岛近海之地，与山东半岛有海路可通。

(3) 曹魏时期迁往山东半岛。据上文所引《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的记载可知，汶县居民于曹魏时期大量迁往山东的齐郡，并且在那里设置了新汶县，可见汶县之民迁徙人数之多，已经足以够成一个新的县城。那么，魏晋时期尽管还保留“汶县”之名，但留在汶县原址的居民也所剩无几了。

(4) 位于平郭县城之北。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慕容皝派兵征讨割据平郭（今熊岳镇温泉村汉城址）的慕容仁，“与仁战于汶城北”^④。慕容皝的军队自辽西而来，此时尚未占领平郭，不能越过平郭与慕容仁交战，因此，汶城必然在平郭县城之北，即在今熊岳地区以北。

以上四个条件来衡量，“瓦房店市陈屯村说”不符合位于平郭县城之北的条件，“海城市析木说”不符合近海、临河的条件，可商榷者唯有

① 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29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 李有升主编《营口地方史研究》第7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

③ 崔艳茹、崔德文等《营口市文物志》第5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④ 《资治通鉴》卷95，“晋纪”17。

“大石桥市进步村说”。

3. 进步村遗址不是文县城址

进步村遗址位于大石桥市永安镇进步村南，该遗址最初发现于1981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据《营口市文物志》介绍：“从遗存看，土城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100米，城内面积约二万平方米。遗物可见的有汉代布纹瓦和绳纹砖等建筑材料。村民在1950年于地下1米处，发现长5.3米、宽1.3米的砖墙，墙下为夯土墙。”

这段描述的资料来源是1981年第二次文物普查的登记记录，笔者查阅了“二普”档案，原记录为表格形式，面积一栏填的是：“200m×100m”；采集遗物：“粗绳纹砖，布纹瓦”；文化性质和年代：“汉”；备注：“据群众反映，该处在满洲国时韩笑春曾在此地挖土取砖，在地下一米处有四尺宽、一丈六长的砖墙，上为一层立砖，下两层为平砖，再下是夯土墙，由于此处现正在修建水库，故整个遗址已全部破坏。”

可见，在“二普”时就未曾见到过所谓“土墙”，只是在地表采集到粗绳纹砖和布纹瓦，根据遗物的分布范围确定遗址范围，这也是考古调查常用的手法，而并不是像《营口文物志》所说的“土城的范围”。再者，据“二普”档案记载，所谓“土墙”只是根据村民介绍曾发现过地下有“夯土墙”，但从其宽度（4尺即1.3米）来看，绝不可能是城墙的宽度。2009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时，笔者与大石桥普查队一起对进步村遗址进行了复查，该遗址已荡然无存，仅在进步村北小工厂的一处断崖剖面内发现有泥质灰陶的残片和绳纹砖，可以确定这是一处汉代墓葬。

进步村遗址附近没有大的河流，最近的淤泥河也在5公里开外，而且距离海口更远，不符合滨海、临河的条件。该遗址距离英守沟汉城址（汉代安市县）不足10公里，汉代不可能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设置两个县。大石桥境内的汉代墓葬群主要集中在汤池英守沟周围，进步村周围没有发现密集的墓葬群，因此，把进步村遗址考证为汉代文县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该遗址只能算做一处汉代生活居住址。

4. 文县应位于盖州城关遗址。

从营口地区汉代遗址及墓葬的分布特点来看，主要集中在大石桥市汤

池镇英守沟村、盖州市城关镇、鲅鱼圈区熊岳镇温泉村三个区域，每个分布区都是以一处城址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密集的墓葬群和生活遗址。这三大区域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正是与汉代的安市、文（汶）和平郭三个县治相对应。

英守沟汉城址目前已被公认为汉代安市县遗址，熊岳温泉汉城址作为汉代平郭县治也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盖州城关遗址，据《营口市文物志》所公布的考古调查资料显示，该遗址坐落在明代盖州卫砖墙之下，东西约 800 米，南北约 600，在明城墙下的夯土墙中发现大量汉代陶器残片，又在钟鼓楼西南地下发现汉代排水设施。该城址周围皆分布着密集的汉墓群，墓葬类型包括土圜贝壳墓和绳纹砖室墓两大类，其年代涵盖西汉早中期至东汉。有学者据此认定为该遗址是汉代平郭县的县治，但是，从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来看，熊岳温泉汉城址更符合平郭县的特征^①。因此，笔者认为，盖州城关遗址不是汉代平郭县县治而应是汉代文（汶）县县治所在地，其理由如下：

（1）该遗址符合文县临河、近海的地理条件。盖州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西濒渤海湾，大清河从县城南郊绕城而过注入渤海，该遗址就坐落在大清河北岸的高台地上。

（2）该遗址符合位于平郭城北的条件。

（3）该遗址周围的墓葬年代符合汶县于曹魏时期迁徙齐郡的史实。如前所述，汶县居民于魏正始元年渡海迁往山东半岛的齐郡，并设置新汶县以居之，原汶县居民必定所剩无几，而盖州城关遗址周围墓葬的年代大多为西汉，少数为东汉，魏晋以后则极其罕见，正符合汶县的这一特点。

（4）熊岳温泉至盖州城关约 35 公里，盖州城关至汤池英守沟约 30 公里，三者距离基本相等，也符合汉代“百里为县”的制度。

综上所述，“文亭”并非亭级建置，而是王莽改制时与其它 100 多个郡县一起被加了一个有祥瑞含义的“亭”字，其县治的规模也绝不是以往所想像的面积极小的城址，而是一个与平郭、安市等县城规模相当的汉

^① 见阎海《熊岳及周边地区汉代文化遗存简述》，《旅顺博物馆学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代城址，其具体位置就是今盖州市城关镇汉代遗址。

二、平郭县与建安城

平郭是西汉时期在营口地区所设立的县级行政建置，是辽东郡盐官和铁官的所在地，在两汉至两晋时期是辽东郡重要的经济重镇和军事重镇。高句丽占据辽东后，平郭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建于高山之上的山城建安城。两城虽不在一地，但所辖范围相同，分别为汉晋和隋唐时期营口地区最高的行政建置。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平郭与建安两城的设置、沿革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

（一）汉晋时期的平郭城

“平郭”一名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西汉时期。

《汉书·地理志》：

辽东郡，……县十八：……平郭，有盐官、铁官。

平郭是两汉期间东北唯一的煮盐与冶铁的生产基地，堪称东北的盐铁重镇。平郭县遗址位于今营口鲅鱼圈区熊岳镇温泉村，城址坐落在熊岳河北岸的高台地上，目前已不见城墙遗迹，但城内地势明显高于四周，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长约300米，城内文化层厚约1米，遗物有豆柄、器耳、口沿、器底等陶器残片及布纹瓦、卷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遗址周围分布着密集的汉魏时期墓葬群，随葬品数量丰富，制作工艺精美，其中“宜子孙”铜镜、陶楼、文字砖等都为辽宁地区所罕见。

平郭设县在文献记载上是始于西汉时期，但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战国后期，平郭就已经是一个商业贸易十分繁华的城镇。自民国以来，在熊岳河两岸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其中尤以燕国的“襄平布”居多，这与文献所记载的燕昭王时击退东胡设置辽东郡的历史时间相符合，说明在战国后期，这里已经是燕国辽东郡所属的地区，至于当时是否已经在平郭设县，因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目前还不能肯定。

两汉时期，平郭县以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名著青史，但作为辽南咽喉要塞，其军事地位还没有彰显出来，主要原因是“两汉时期高句丽入侵辽东郡大多走的是辽宁东北部一线。至魏晋以后，特别是三燕时期，辽南地